

# 城乡等值：新时代背景下的乡村发展新路径

叶红 唐双 彭月洋 陈可 李贝宁

**提 要** 当前，中国已全面进入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薪新时代，正处在城镇化率超过60%的关键节点，城乡发展面临重大转型。以“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为代表的国外发达国家主流路径并不适用于新时代的中国国情，而主动寻求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模式，主动构建乡村价值重塑与乡村发展的新路径，避免被动的逆城市化，则是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城乡发展的适宜选择。通过研究国内外近现代以来的城镇化进程及其差异化特征，基于城乡等值理念，并结合后疫情和移动互联与智能化两个重要的时代背景，揭示乡村价值及其发展机会的变化，提出乡村发展的核心内涵与关键路径，并对其实施的可行性及研究意义进行探讨与展望。

**关键词** 城乡融合；城乡等值；后疫情时代；移动互联与智能化时代；乡村发展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6361/j.upf.202103007  
文章编号 1000-3363(2021)03-0044-06

## 作者简介

叶红，博士，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华南理工大学乡村振兴与发展研究院院长，yehong@scut.edu.cn；  
唐双，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硕士研究生；  
彭月洋，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硕士研究生；  
陈可，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  
李贝宁，华南理工大学乡村振兴与发展研究院技术总监，广州市方略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

Urban and Rural Parity: A New Path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YE Hong, TANG Shuang, PENG Yueyang, CHEN Ke, LI Beining

**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 has entered a new era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It is a critical juncture when the country's urbanization rate exceeds 60%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is undergoing a major transformation.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the developed world,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urbanization, suburbanization, counter-urbanization, and re-urbanization", is not suitable for China in the new era. Instead, China should actively seek new models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actively build rural values and corresponding development strategies. New rural development, which is suitable for the new era, should avoid passive counter-urbanization.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of the concept of urban-rural parity and the contexts of the post-pandemic and mobile internet ag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and its differentiated characteristics since modern times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 reveals the changes in rural values and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explicates the core meanings of rural development, puts forward a principal path of rural development, and projects the feasibility and research significance of its implementation.

**Keyword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urban-rural equivalence; post-epidemic era; mobile internet and intelligent era; rural development

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预言，美国的高科技和中国的城市化将是21世纪影响人类进程的两件大事（仇保兴，2007）。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截止2020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60%，标志着我国已全面进入城镇化中后期，并面临消化城镇化快速扩张所累积矛盾的重要窗口期（王凯，等，2020）。中国作为城镇化后发国家，用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城镇化进程，创造了世界少有的城镇化奇迹。那么，中国的乡村振兴是否会创造新的奇迹？正确认识乡村的价值，并研究制定适宜的发展路径，变得迫切而必要。

政策制度供给、学术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乡村建设行动等多层面多类型的研究实践带来乡村角色与特征的显著变化（李京生，2018），而移动互联与智能化时代带来乡村生产生活方式的重大转变，也对乡村价值的重塑带来重大影响。本文通过对比研究国内外城镇化进程，揭示我国城乡发展的阶段历程与转型发展的关键议题，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深入研究乡村价值和发展机会的变化，基于城乡等值理念提出乡村发展新路径，以期为中国推动城乡融合、缩小城乡差距提出有益的思考与建议。

## 1 国内外近现代以来城镇化与城乡发展的主要历程及路径转型思考

### 1.1 1949年以来中国城镇化与城乡发展的主要历程

有效的政府和公共政策引导是中国城乡实现转型的关键（刘守英，等，2018），通

过梳理1949年以来中国城乡关系、城镇化和乡村发展的政策演变(表1),可以总体揭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乡关系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图1):①1949—1977年,中国走的是“以行政手段干预人口迁移”“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人为控制城镇化的发展道路,形成了“城市偏向”的发展战略、市民偏向的分配制度以及重工业偏向的产业结构(赵海林,2010),并形成了巨大的城乡差距和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②1978—2005年,我国学者对国外“城市偏向”的城镇化路径进行了批判性思考,并基于对我国城镇化的正确认识,即在“双重转型背景”下,由“双动力”“双重主体”推动的,具有“双重城镇化方向”和“双重发展模式”的城镇化,由此出现“乡镇偏向”与“城市偏向”理论并存现象(辜胜阻,等,2009),但是在城乡二元体制作用下,我们走的依然是“牺牲乡村发展城市”的城镇化道路,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③2006—2020年,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背景下,政府分步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乡村”“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以乡促城”等城乡发展理念,开展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等行动,改善乡村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条件;出台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一系列政策和制度,推动乡村现代化发展,着力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

## 1.2 国外发达国家近现代以来城镇化与城乡发展的主要历程

回顾西方国家的城镇化道路,1920年代城镇化初期,西方社会以“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托达罗”模型、“乔根森”模型和增长极理论、核心-边缘理论等为主要代表,认为“城市——工业”的加速增长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和现代化,并且这种增长能够通过“涓滴效应”扩散到乡村地区(张晴,等,2009)。这些“城市偏向”的理论模型和发展理念助推了西方国家城镇化水平的快速提升。1960年代后,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达到60%,持续快速的城镇化带来了一系列城乡发展矛盾,由于非均衡发展带来以“城市病”为特

表1 1949年以来中国城乡关系及城乡发展政策演变

Tab.1 Policy evolution of China's urban-rural relations, urbaniza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since 1949

时段	城乡关系	重要政策
阶段一 1949—1977年	城乡分离、对立阶段:牺牲农业,发展重工业。形成了巨大的城乡差距和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	1953年,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陆续颁布了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城市劳动就业和社会福利等制度与政策,一方面严格限制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另一方面极大地保护了城市居民的利益
		1956年,在《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提出“上山下乡”等政策,更是使得城镇人口倒流农村
		1958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严令限制乡村人口流向城市
阶段二 1978—2002年	城乡失衡发展阶段:工农业互动、共同推动工业化。农业价值继续被抽取,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	1982—1986年,五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合作化、土地承包、统购派购)进行总结,重视农业生产及其制度改革
		2003—2005年
阶段三 2006—2020年	城乡统筹协调发展阶段:总体上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以乡促城”的发展阶段	2006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略;2006年正式全面取消农业税;
		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发展现代农业;十七大提出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发布《关于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要始终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2008—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2010—2012年,三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重视农业发展的基础条件完善;2013—2016年,四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将现代农业发展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
2017—2020年	城乡融合发展阶段:全面脱贫攻坚,实施乡村振兴。着力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城乡差距逐渐缩小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并提出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
		2018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实施乡村振兴,将农村发展置于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3月,“两会”期间习近平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的讲话——首次提出“五大振兴”;9月,纲领性文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发布;
		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2020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提出“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9月,农业农村部发布《关于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优先支持乡村振兴的意见》;10月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深化农村改革,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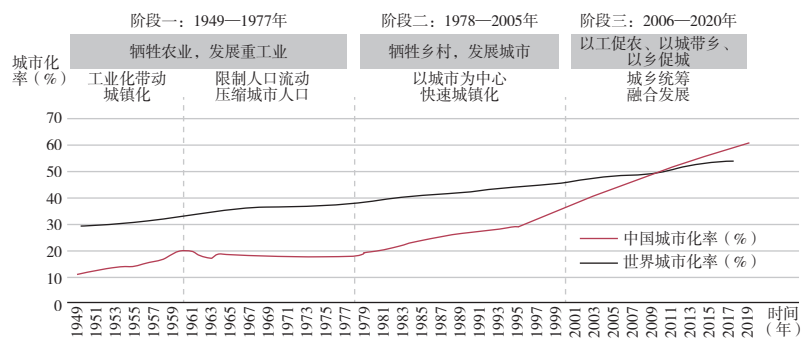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城市化率与城乡关系发展阶段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China's urbanization rate and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征的城市社会经济问题日益严峻,逐步引发了郊区化和逆城市化等现象出现,并催生了一系列乡村建设行动。

各具特征的国情、历史及其资源条件也对不同发达国家的城乡发展起到重要影响。如日本在工业化、城镇化的不同阶段都通过法规来明确农业农村在城乡发展中的地位,使其能在快速的城镇化扩张中生存,并演化为高端优质的都

市型农业;再如新加坡采取政府主导式的农业政策,推动郊区混合农业向现代化的都市农业转型。基于高度紧张的人地关系、极度紧缺的资源条件,东亚发达国家农业农村的发展突破了西方国家工业化、城镇化早期“城市食物供给”理论体系的依赖,实现了“农业工具论”传统误区的认知转向。相关理论和实践理念,也在一定程度上指导了以上海郊

区小城镇为代表的城镇化发展与都市农业实践（陈秉钊，等，2001）。

### 1.3 对中国城镇化与城乡发展路径转型的思考

“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的西方国家城镇化发展路径，实际上并不适用于新时代的中国，而基于“新田园城市构想”“稀有性经济理论”“都市型农业”的东亚发达国家城镇化发展路径，亦需要结合中国城乡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城乡要素趋于自由流动的新时代背景予以科学借鉴。从地理空间的角度来看，中国乡村所占的国土面积广阔、人口众多；而中国的基建速度和基建水平在近年来发展迅速，日趋世界领先，让城乡交流更加密切；从文化传统来看，中国人也更追求落叶归根，而乡村是绝大部分家族文脉的根系所在；从新中国城乡发展的历史来看，乡村亦扮演着重要角色，化解了中国面临的多次社会经济危机。因此，新时代的中国城乡发展完全具备条件避免陷入被动的逆城市化，通过正确认知乡村的价值及其发展机会的变化，主动走出一条城乡等值的发展道路，并主动寻求新时代背景下的乡村发展新路径。

## 2 城乡等值理念下新时代乡村价值的重塑

基于全球化发展的普遍规律以及城乡等值融合发展的本土趋势，我国城乡资源的价值内涵正在加快重塑，城乡社会的发展方向面临重大转型。识别新时代的关键背景，构建对乡村正确的价值判断，将对乡村政策模式选择与乡村资源有效利用产生重要影响。移动互联网和智能化时代让分散的、远程的生产和生活成为可能，后疫情时代又让健康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成为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对两个体现社会经济供需特征的时代背景形成有效认知，有助于揭示乡村价值及其发展机会的变化。

### 2.1 城乡等值的核心理念：让乡村和城市实现等值化、差异化融合

“城乡等值”源于二战后德国巴伐利亚州，其通过土地整理、村庄革新等城

乡等值发展模式，在可持续发展、因地制宜、系统化、治理原则的指导下，实现从落后的农业地区到经济强大、生态宜居地区的蜕变（毕宇珠，等，2012）。其核心理念是指通过消除城乡生产、生活质量差别，保留、强化城乡特色差异，加快城乡公共资源等要素均衡配置，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实现城乡生产生活“等值化”“差异化”的目标。城乡等值理念下的乡村发展，应当充分挖掘乡村特色和资源价值，结合市场力量，在公共政策引导下进行社会投资和政府财政再分配，实现城乡等值融合。

### 2.2 移动互联网和智能化时代：让分散的、远程的生产和生活成为可能

技术的变革首先带来生产的转变，再逐步转向生活，进而推动城乡社会发展，技术的创新也将克服时空的限制，扩展每个个体的时空感受，同时又将不同个体紧密联系起来（刘少杰，2016）。城市作为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其土地、空间资源的“高效率”“高效益”利用，促成了各类实体要素的高效集聚。但在技术条件全面迭代的“工业4.0时代”——移动互联网和智能化时代，需要对“高效率”“高效益”的内涵及其空间场所进行重新思考。移动互联网与智能化时代具备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以及社会空间虚拟化三大特征，对于传统空间关系的影响愈发深远，重塑着空间可达性的概念内涵（毛茗，等，2021）。虚拟生产要素和实体生产要素的高效集聚并行不悖，共同促进社会关系、内容生产以及产品形态实现去中心化，让超越传统城镇化的发展路径依赖成为可能，让远程、分散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成为可能，使得乡村可以在低密度的发展场景中逐步实现“空间分散而要素融合”的高效发展，成为乡村现代化的新形式。

### 2.3 后疫情时代：让健康的生活和生活方式成为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

蔓延全球的新冠疫情，正持续冲击着人们的生活观念，使得生命健康、低密度与田园化的生活方式愈发受到高度重视。一方面，疫情催生和提高了人们的健康自觉，产生了对于生命健康更高的需求（唐魁玉，等，2021），高人口密

度的城市空间为人们疫情时期的生产、生活带来隐患，而乡村优质的生态环境和低密度的空间能够很好地满足人们对于生命健康的追求。另一方面，疫情导致了公共活动和社交距离的限制，城市居民在实体空间中的必要性、自发性和社会性活动均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现有的城市开放空间无法满足疫情时期居民对于公共活动的需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甚至动物的接触与交流变得稀缺和受限，而乡村作为大型的开放式景观系统，则能够很好地满足人们回归社群与回归田园的需求。

### 2.4 乡村价值的重塑

城乡等值理念与两个时代背景对乡村价值的重塑产生了关键影响。在城乡等值理念下，乡村不再是内生封闭的系统，不能就乡村论乡村；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乡村的需求发生转变，同时，科技的创新发展为这种转变提供了有效支撑，使得乡村功能不再是单一的农业生产，不能用传统农业社会的眼光去看待乡村。然而，学界、业界对于乡村价值和乡村振兴的内涵判断依然存在多种观点，有的专家认为“现代化的实现就是由乡变城的转型”，“现代化就是城市化”；有的专家认为乡村应该是缓慢发展的，是维持社会稳定的载体，是城市最后的退路，甚至认为“乡村振兴只是一场政治按摩”。这些观点值得讨论，可能会导致乡村的生态文明价值及其承载新乡民、新文化、新业态的能力趋弱，从而更加固化城乡二元结构。

基于城乡发展转型和乡村价值重塑的思考，提出主动寻求新时代背景下的乡村发展新路径，并以珠三角、粤北、粤西等典型地区开展理论和实证研究，从而构建乡村适宜的价值判断，理解乡村振兴对城乡中国的重大意义，以期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各项政策与发展模式制定提供科学的价值观和理论支持。

## 3 城乡等值理念下乡村发展的新路径

乡村发展的新路径，是在持续推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辩证地保护城乡差异，主动构建新型的城乡关系、



多元的乡村业态、复合的乡村功能、清晰的城乡边界，注重以城乡等值融合发展为切入点，依托开放式的农业景观和生态系统，在乡村培育具备生态与文化特色的场景，促进乡村成为优质新型生产和生活的良好载体，塑造宜人的、具有鲜明低密度特征的地景状态，使乡村能够提供有别于城市的优质产品和优质服务，实现生态资源转变为生态资产、多主体的费用投入转变为资本化投入，塑造和城市互补共生的乡村地域综合体。

### 3.1 新型的城乡关系：以等值融合发展为目标导向，实现以城带乡，以乡促城

城乡等值融合发展，其核心在于推动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发展，实现城乡居民在收入、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生活品质上的等值，提倡城乡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提倡正确处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并科学提升乡村的生态、文化及经济价值。以此为目标导向，应逐步消除城乡发展壁垒，实现资本、人才、先进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形成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互补、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图2）。随着等级化、网络化以及地域化的发展动力演变，城乡一体的经济地理空间正在不断重塑，以往注重“地理临近”，未来注重“功能网络”（郑德高，2021），一系列都市圈、城市群以及中小城市区域网络的共同作用，将进一步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均衡从而推动城乡等值融合发展创造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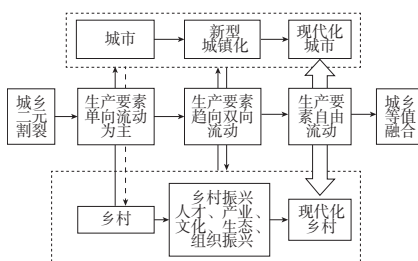


图2 新型的城乡关系示意图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new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当然，根据不同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发展阶段，需要差异化地推动城乡发展与乡村建设。以广东为例，正以

“打造与粤港澳大湾区相匹配的美丽乡村”为目标，推进具有岭南特色的宜居城乡建设，构建优质的城乡生活圈。根据2020广东统计年鉴数据，2019年广东珠三角、粤东、粤西、粤北地区人口城镇化率分别为86.28%、60.38%、45.81%和50.80%，各自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这就决定了在推动城乡等值融合发展的实践中需要因地制宜。在以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为代表的发达地区，需要注重的是高速城镇化的场景下如何调配公共财政和市场资本的杠杆，不能再以农业社会的眼光来规划建设乡村，而是应该结合城市的视角、运用全域发展的视野看待乡村，其发展建设中城市是重点，乡村则应该成为多产业联动、多要素集聚的亮点；而在非核心区（珠三角外围）以及外延区域（粤东、西、北）为代表的欠发达地区，更需要注重的是提升乡村环境品质、治理水平和乡风文明，树立文化自信、生态自信，发挥自身资源价值，为城乡资源资本要素的高效流通主动做好准备、主动迎接机会。

### 3.2 多元的乡村业态：以农业和自然景观为重要场景，促进区域视角的一、二、三产联动发展

过去，在生产主义视角下，乡村等同于农业，乡村的发展一味追求高强度和产业化的农业生产，造成了乡村生态环境和产业发展的不可持续（张京祥，等，2014），而如果我们不再单纯以传统三次产业的产值来计算乡村生态资源的价值，不再只考虑农业产值对于乡村的作用，此时的农业和自然景观就变成了乡村业态实现供需聚合、彰显魅力与活力的重要场景。有一组关于生态系统产值（GEP）及其实践效益的数据印证：从化区作为广州市的乡村振兴示范区，是粤港澳大湾区北部生态核心区和农业农村发展腹地，其2019年GEP大约为1000亿左右，是其同期GDP的3倍多，获评2020《广州城市治理榜》GEP特别奖；其环境竞争力连续4年位居广州各区榜首、旅游综合竞争力连续9年在全省67个县（市）当中排名第一；通过培育现代都市农业，近年来建立了6个省级以上现代农业产业园、10个现代农业研究院；以粤港澳大湾区“农业硅谷”的创

新景象为载体，通过盘活乡村土地、闲置资产，搭建了20个风格各异的特色小镇作为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平台；培育了全国首个生态设计产业集群，吸引数字艺术、集成电路等80多家国内外生态设计企业落户；高端优质的生态环境和发展场景，吸引了一批院士工作室以及全球各地的优秀“三农”人才落户从化；而多元的乡村业态，又助推了370多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显著提升本土农产品和农业品牌价值，自2017年以来，全区农民人均收入年均递增超过11%。

乡村有条件也应该发展多元化的产业，以现代农业为载体，以新型产业为主导，以精品人居为提升，以创意文化为灵魂，打造乡村多元业态，以县域、镇域或乡村群为统筹单元，实现区域视角的一、二、三产联动发展。其中：一产朝着现代农业、特色农业方向提升，实现安全、质量与品牌价值的有效传递，其发展在保障区域粮食安全的基础上，还可以作为乡村优质生产生活的场景和载体（叶红，等，2019）；二产是带来农副产品加工、乡村建材、乡村旅游产品生产等需求和市场，应逐步改善传统低收益的农产品加工，通过深加工或规模化经营、品牌构建、高科技运用、艺术设计等手段增加产业的附加值（陈磊，等，2006）；三产是有效导入和带动农耕体验、乡村旅游、乡村研学、田园民宿、文化艺术等多种业态，塑造新型乡村社区，对于资源条件适宜的地区，还可以因地制宜地发展新型产业，如医疗健康、科技创新、金融服务等产业，吸引高端人才到乡村工作和居住，而不只是短暂地停留（图3）。通过挖掘乡村的优势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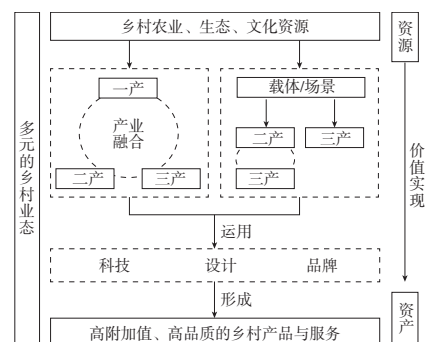


图3 多元的乡村业态示意图

Fig.3 Schematic diagram of diversified rural economy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源，将资源转变为资产，促进多元产业的融合共生，从而有效带动乡村发展并形成良性循环，加强城乡的产业互动联系，促进城乡协同发展，共同繁荣。

### 3.3 复合的乡村功能：以生态与文化为比较优势，培育优质生产生活的理想载体

在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背景下，政策引导、产业升级和社会需求等因素驱动着乡村空间在结构体系、空间布局和用地功能上的重构（李和平，等，2021）。乡村将承载更多生态、文化、生产和生活的复合功能，并将生态与文化资源的比较优势转变为生态价值与文化价值，进一步创造经济价值，而结合前文关于新型的城乡关系的相关阐述，我们仍然需要在“以城带乡，以乡促城”的语境下构建复合的乡村功能。对于城市，需注重存量更新视角下的高质量发展，为城乡发展提供高等级公共服务、聚集产业经济发展和人口就业，并注重和乡村互动共生、发展绿色增量，引导适宜的技术、人才、资金等要素融入乡村，实现对乡村发展的经济反哺和乡村治理的政治反哺（施德浩，等，2019）；对于近郊地区乡村，则需结合高速城镇化的发展场景，践行生态新经济和绿色新文明，科学结合城市发展的视角，承载高端优质的新经济、新文化、新乡民；对于远郊、边远地区乡村，则需以生态涵养、农业生产和文化保育为基础，提供各具特色的生态与文化产品，为城乡要素高效流通做好准备（图4）。

而基于复合的乡村功能，笔者建议国土空间规划等领域所界定的“农业空间”应改为“乡村空间”，否则会极大地削弱乡村的价值。国土空间规划所划定的“农业空间”，定义为“以农业生产和农村居民生活为主体功能，承担农产品生产和农村生活功能的国土空间，主要包括永久基本农田、一般农田等农业生产用地以及村庄等农村生活用地”，实际上，“乡村空间”不只承载着农业生产功能和农村生活功能，还承载着愈发多元化的功能和多样化的人群。如果依旧把乡村定义为农业空间，容易让人误解为乡村今后还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但实际上未来乡村的功能和价值远不止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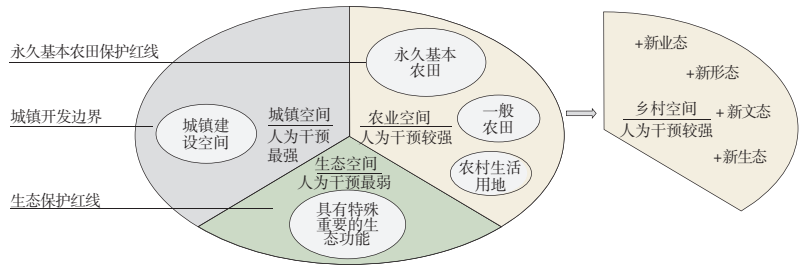


图4 基于复合乡村功能的“乡村空间”示意图  
Fig.4 Schematic diagram of "rural space" based on rural multi-functionality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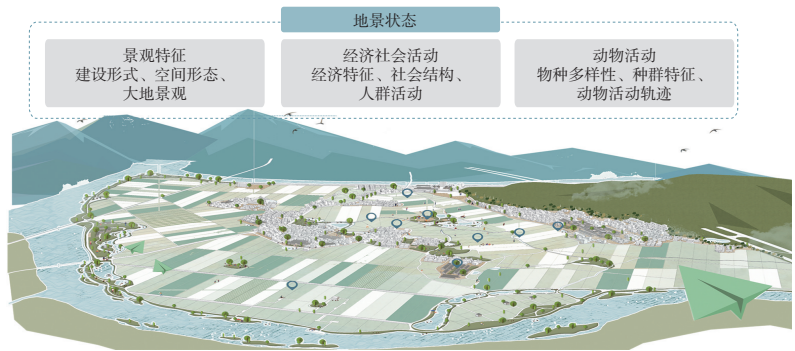


图5 地景状态的概念内涵示意图  
Fig.5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oncept of landscape state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 3.4 清晰的城乡边界：以低密度的地景状态，塑造有别于城市的乡村特征与乡村空间

在未来，城和乡依旧有别。最显著的区别就在于地景状态，乡村将永远保持一种低密度的和绿水青山相容的地景，承载着多元的业态、复合的功能。在工业化时代，乡村现代化发展缓慢，得以保存较好的地景状态与乡村风貌；在信息化时代，新的信息技术使乡村现代化发展突破空间上的集聚，城乡要素自由流动，但地景状态依然存在差异。如果乡村也像城市一样进行高密度的开发建设，就变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城市化。真正的城乡融合，更需要界定清晰的城乡空间，边界越清晰才能够正确评价城市和乡村的资源价值。传统的以土地权属、产业经济、人口密度、行政边界等要素界定城乡的方法已不适应新时代乡村的价值及其发展特征，而识别城乡的地景状态是划定其边界的有效途径。

结合景观生态学中的复合种群理论、缀块——廊道——基底模式与空间格局概念（邬建国，2000），以及地理学的乡村性概念（张小林，1998），笔者提出：地景状态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景观特

征，包括建设形式、空间形态、大地景观等要素，及其承载的人与动物的相关活动（图5）。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视角下，对乡村的景观特征、人的经济社会活动、动物的活动等方面进行分析，对乡村的空间形态、生态景观、经济活动等进行明确的管控。在规划层面，对乡村地区进行分区分级分类的全域空间管控（耿慧志，等，2020）；在设计层面，加强对各类活动的分析研究从而引导重点区域空间格局和景观风貌的设计。以地景状态作为城乡界定的依据，构建清晰的城乡边界，确保乡村保有优质的生态、文化等地域资源和优质的生产、生活空间载体，才能推动真正意义上的城乡差异化、等值化的融合。

## 4 结语

立足结合“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碳中和”等国家战略全面推进的新起点，城乡等值理念下乡村发展新路径的提出，还旨在推动未来的中国新农村成为生态新经济和绿色新文明的最佳载体，助力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



面向下一步的理论研究以及实证辨析, 还需结合乡村实现全要素振兴的需求与当前存在的问题, 对资源数字化、技术现代化、村民多元化、治理新型化、生态产业化等议题进行理论框架和方法论的系统探讨, 并以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与管控研究为平台, 对相关政策制度的供给进行系统研究; 而基于“流空间”“流乡村”等新理念, 对于边远地区实现城乡等值的可行性和因地制宜的实施路径, 也是笔者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毕宇珠, 苟天来, 张骞之, 等. 战后德国城乡等值化发展模式及其启示——以巴伐利亚州为例[J]. 生态经济, 2012(5): 99-102+106. (BI Yuzhu, GOU Tianlai, ZHANG Qianzhi, et al. The equivalence development model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Germany after the war and its enlightenment: taking Bavaria as an example[J]. Ecological Economy, 2012(5): 99-102+106.)
- [2] 陈秉钊. 上海郊区小城镇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M]. 科学出版社, 2001. (CHEN Bingzhao. Research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in small towns in the suburbs of Shanghai[M]. Science Press, 2001.)
- [3] 陈磊, 曲文倩. 解读日本的造村运动[J]. 当代亚太, 2006(6): 29-35. (CHEN Lei, QU Wenqiao. Interpretation of the Japanese village-making movement[J]. Contemporary Asia-Pacific Studies, 2006(6): 29-35.)
- [4] 耿慧志, 李开明.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乡村地区全域空间管控策略——基于上海市的经验分析[J]. 城市规划学刊, 2020(4): 58-66. (GENG Huizhi, LI Kaiming. The regulation of whole rural space under the territory development planning system——analysis based on Shanghai's experience[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20(4): 58-66.)
- [5] 辜胜阻, 易善策, 李华. 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9, 19(1): 47-52. (GU Shengzu, YI Shance, LI Hua. Research on the urbanization pa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09, 19(1): 47-52.)
- [6] 李和平, 贺彦卿, 付鹏, 等. 农业型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动力机制与空间响应模式研究[J]. 城市规划学刊, 2021(1): 36-43. (LI Heping, HE Yanqing, FU Peng, et al. A research on the dynamics of and the spatial responses to the restructuring agricultural rural settlements[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21(1): 36-43.)
- [7] 李京生. 乡村规划原理[M].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8. (LI Jingsheng. Principles of rural planning[M].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2018.)
- [8] 刘少杰. 网络社会的时空扩展、时空矛盾与社会治理[J]. 社会科学战线, 2016(11): 197-203. (LIU Shaojie. The expansion of time and space, contradictions in time and space and social governance in network society[J]. Social Science Front, 2016(11): 197-203.)
- [9] 刘守英, 王一鹤. 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J]. 管理世界, 2018, 34(10): 128-146+232. (LIU Shouying, WANG Yige. From rural China to urban-rural China: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changes in China's transformation[J]. Management World, 2018, 34(10): 128-146+232.)
- [10] 毛茗, 罗震东, 兰菁. “流乡村”理念下边远乡村发展策略与规划研究——以贵州省石阡县楼上村为例[J].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 2021, 36(1): 19-25. (MAO Ming, LUO Zhendong, LAN Jing.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planning of remote villages under the concept of "flowing villages"——taking Loushang village, Shiqian county, Guizhou province as an example[J]. Journal of Human Settlements in West China, 2021, 36(1): 19-25.)
- [11] 仇保兴. 实现我国有序城镇化的难点与对策选择[J]. 城市规划学刊, 2007(5): 1-15. (QIU Baoxing. Difficultie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realizing orderly urbanization in my country[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07(5): 1-15.)
- [12] 施德浩, 陈浩, 于涛. 城市要素下乡与乡村治理变迁——乡村振兴的路径之辩[J]. 城市规划学刊, 2019(6): 107-113. (SHI Dehao, CHEN Hao, YU Tao. Urban factors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and the change of rural governance——the debate on the path of rural rejuvenation[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9(6): 107-113.)
- [13] 唐魁玉, 梁宏斌. 后疫情时代生活方式的选择[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3(1): 50-57. (TANG Kuiyu, LIANG Hongbin. Lifestyle choices in the post-epidemic era[J]. Journal of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1, 23(1): 50-57.)
- [14] 王凯, 林辰辉, 吴乘月. 中国城镇化率60%后的趋势与规划选择[J]. 城市规划, 2020, 44(12): 9-17. (WANG Kai, LIN Chenhui, WU Chengyue. Trends and planning choices after China's urbanization rate reaching above 60% [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20, 44(12): 9-17.)
- [15] 邬建国. 景观生态学——概念与理论[J]. 生态学杂志, 2000(1): 42-52. (WU Jianguo. Landscape ecology——concept and theory [J]. Chinese Journal of Ecology, 2000(1): 42-52.)
- [16] 叶红, 魏立华, 阮宇超, 等. 湾区乡村角色地位与突围策略研究[J]. 上海城市规划, 2019(5): 16-21. (YE Hong, WEI Lihua, RU-AN Yuchao, et al. Study on the role status and breakthrough strategies of villages in the bay area[J].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19(5): 16-21.)
- [17] 赵海林. 统筹城乡发展必须转变城市偏向发展战略[J]. 中国乡村发现, 2010(2): 24-27. (ZHAO Hailin. The overall planning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must change the urban-biased development strategy[J]. China Village Discovery, 2010(2): 24-27.)
- [18] 张晴, 罗其友, 刘李峰. 国外城乡统筹发展的做法与经验[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09, 30(2): 76-80. (ZHANG Qing, LUO Qiyu, LIU Lifeng. The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of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broad[J]. China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2009, 30(2): 76-80.)
- [19] 张京祥, 申明锐, 赵晨. 乡村复兴: 生产主义和后生产主义下的中国乡村转型[J]. 国际城市规划, 2014, 29(5): 1-7. (ZHANG Jingxiang, SHEN Mingrui, ZHAO Chen. Rural revival: China's rural transformation under productivism and post-productionism[J].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14, 29(5): 1-7.)
- [20] 张小林. 乡村概念辨析[J]. 地理学报, 1998(4): 79-85. (ZHANG Xiaolin.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rural area[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1998(4): 79-85.)
- [21] 郑德高. 经济地理空间重塑的三种力量[M].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21. (ZHENG Degao. The three powers of reshaping economic geographical space[M].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2021.)

修回: 2021-05